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世界通史

(第二版)

王斯德 主编

第一编

沈 坚 金志霖 著

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世界通史

(第二版)

王斯德 主编

第一编

沈 坚 金志霖 著

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

——1500年以前的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通史(第二版). 第一编, 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王斯德主编. —2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7202-7

I. 世… II. 王… III. ①世界史: 通史—高等学校—教材②世界史: 古代史—高等学校—教材③世界史: 中世纪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8033 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世界通史(第二版)

第一编 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主 编 王斯德
著 者 沈 坚 金志霖
责任编辑 庞 坚
审读编辑 李 雯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48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202-7/K·315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和世界历史是类似同心圆结构的三个既重合又不同的概念。其中,人类历史是涵盖面最大的圆,从地球上出现最初的人类群体算起,大约已有 300 多万年;人类的文明史一般指脱离了蒙昧和野蛮状态、有了文化传承和形成了社会运作机制的人类历史,这样的文明社会历史大约已有五六千年;世界历史则是最小的圆,它是指人类社会进入了整体性发展、形成了世界性体系结构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历史,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①这一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大约发端于 16—18 世纪,目前仍在延续、发展。

《世界通史》,顾名思义是对世界历史的通观,它所考察的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性历史运动的发展进程。它之所以区别于国别史和地区史,首先就在于它以“世界”——人类社会的整体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和研究视域;而它之所以区别于更广义的人类史或人类文明史,也在于它所确立的中心概念——“世界”具有结构意义上的特殊内涵,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对人类社会的泛指。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在最近的 500 年间才逐步形成,尽管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上这 500 年的变化是以往任何时段所不能比拟的,但毕竟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程。而且,世界历史的发生学研究也需要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段、各个局部的发展形态中破解整体性运动得以形成的历史基因及其组合密码。因此,《世界通史》对人类社会整体运动的考察不可能仅限于 500 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在内容上必然要扩及世界历史的漫长前史,贯通人类社会从远古以来、迄今为止的历史总进程,包含着前世界历史时代的地域性历史。

从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线索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向度:

一是纵向的发展,主要指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为主轴,人类社会由文明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迄今已发生过两次大的文明转型,即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文明向农业(游牧)文明的嬗变;从农业文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2 页。

向工业文明的飞跃。目前,正在继续向更高级的后工业的新型文明演化。虽然在进入工业社会前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文明形态表现不一,各自的发展路径别具特色,但在多样性中仍然展现了人类文明由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简单生产方式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复杂生产方式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诸文明区域之间生产方式的共性特征。这些在相对孤立的发展条件下形成的文明共性,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作为生物种群的统一性和作为社会种群在行为方式上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在地域性文明时期,人类整体性发展的基因已经存在,这就为后来工业文明的全球性扩展提供了前提。

二是横向的发展,主要指不同文明间的接触、交流、融合、冲突和主流文明的扩展。人类社会的早期文明呈点状分布,在各个原始民族的群落独立地发展,以后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共同体结构的扩大,高度分散的文明点逐渐聚合为较大范围的文明区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既缺乏远距离沟通的技术手段,也缺乏外向型发展的驱动力,所以文明的横向扩展是有限的。诸文明区域间的接触和交流主要发生在交通相对便利的欧亚大陆和北非,主要形式是互通有无的贸易和由商人、宗教使者、探险家推动的文化交流,而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战一度建立的跨地域大帝国(如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间文明的交流。但总体来看,各个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基本上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路线平行地发展,地域性特征相当明显。至于有些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和澳洲,因为有沙漠、大洋的阻隔,更是处在与其他地区基本隔绝或完全隔绝的状态,文明发展的孤立性更为突出。一直到15世纪末,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受到纵向发展程度的严重制约,地域性历史的格局没有根本的变化。

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跨越是横向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这一具有根本性转折意义的突破是与纵向发展进程中文明形态的重大飞跃——工业文明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受土地束缚的自然经济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工业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巨大可能性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一社会发展机制上的革命性变化带动了全方位的社会形态的变革,人类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开始于西欧。1500年前后,西欧地区社会结构中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各种因素通过一系列彼此联结的历史运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而会聚、互动,最终为工业文明的诞生准备了知识基础、制度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16—18世纪的200年间,西欧地区的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接踵而至,

在英、法等国首先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原型。此后,就开始了工业文明向全球的扩展。与此同时,以西欧国家为中心的殖民体系作为工业文明扩展的载体而建立起来,到19世纪末,随着世界被列强瓜分即殖民地的“全球化”而形成了世界历史的第一种结构形态——欧洲列强支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辐射世界的经济体,即欧洲国家运作的世界市场,但它的世界性又是不充分的,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获得进入世界体系的自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16—19世纪的世界史还只是世界历史的初级阶段。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已经在工业文明的扩展中启动,但是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还不高,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态还延续着传统的帝国式政治结构,欧洲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还未能展开自主的现代化进程,所以,这一阶段的人类社会整体性运动尚处在较低的水平,很多国家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依然滑行在传统社会的轨道上。

20世纪,在迄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充分地展示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这100年间,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决定性地超越了区域性发展阶段,工业文明的全球普及和现代社会发展机制的全球扩散最终把世界各个区域联结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在经济力量的驱动下,在伴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历史进程中,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新阶段。

从区域现代化向全球现代化的推进,是工业生产力主导下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之所以能在20世纪实现,主要是由于20世纪的历史运动创造了有利于“全球化”的基本历史条件。

第一,20世纪是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革命性突破的时代,由此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说,16—18世纪先后发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地球上的一个区域启动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那么,20世纪初以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创立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及其推动下的持续的技术革命(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在能源、信息、材料、生物工程和空间技术等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通过充分释放工业生产力的潜能,使工业文明的扩展获得了从根本上突破自然区域障碍的强大技术支撑。在现代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条件下,居住在地球各区域的人们已不再受自然的时空间隔的束缚,全球性的人员、资金、物资流动和信息沟通成为现代化世界进程进入全球化阶段的重要特征。

第二,20世纪是世界体系经历裂变和重组、向全球统一的世界市场过渡的时代,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结构。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与世界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的建构表现为同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约从500年前即已开始。但是,在16—19世纪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还不具有充分的世界性,现代化的区域性严重地限制着世界体系的结构特性。那种以

“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在进入 20 世纪后因内外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剧烈动荡和裂变。以战争与革命为基本特征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然而,这一否定性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并不是世界体系的主体,而是它的前现代因素。所以,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恰恰在解构性运动中,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进一步增强了,多种选择取向的出现及其斗争并没有背离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普遍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世界主导力量的转移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为世界体系的重新整合准备了条件。但是,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延缓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结构影响下,世界体系一度表现出二元特性。实际上,这种二元性所反映的仍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作为世界体系基础的世界市场的本质是由经济运动的客观趋向决定的,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和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冷战后,世界市场的全球性得到了充分展示,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世界体系的发展所提供的结构性要素与科技革命所提供的技术性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深刻根源。

第三,20 世纪是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时代,殖民帝国的崩溃和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为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奠定了具有普遍性的单元(行为主体)形态。全球现代化虽然是从区域现代化发展而来的,但本质上它不是某一区域发展类型的放大,而是各个区域内在的现代化因素发展融合的结果。只有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获得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权利的前提下,人类才可能真正形成发展的共识,走上普遍发展的道路。所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走向全球现代化的必要政治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实践发挥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是引导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政治力量,而且为全球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坐标提供了符合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理论导向。

总之,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纵向发展的水平决定着横向发展的程度,横向发展的突破又反作用于纵向发展,使纵向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文明由此发展到今天的高度。20 世纪末的世界相当清晰地凸现了人类历史的“世界性”即整体性发展,也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在全球范围的结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20 世纪基本完成了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以上所述,是我们站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世界历史的总

体认识,也是我们这部三卷本《世界通史》的基本理论架构和分编的依据。我们认为,世界通史作为宏观史学,首先要把握人类社会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的总体运动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由地域性历史向整体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通史的灵魂在于“通”,要有一种贯通古今、融会经纬的历史通感,“登高壮观天地间,俯仰古今一脉流”。同时,通史对历史进程的阐释又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生动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所以宏观考察与微观考察应当有机地结合,取精用弘,执简驭繁,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当然,通史的理论架构可以各有特色,各家“通”法不一。以已有的各种通史著作为例,有的以王朝更迭为主线,有的以社会形态演变为脉络,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有的以社会现代化进程为坐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异的视角,不同的史识,形成各种通史体系,这是学术生态的自然景观。百花齐放,才有百家争鸣,客观历史运动的复杂性需要史学研究的多维性,各种理论架构的通史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解读人类历史,丰富人们的历史意识。就通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不同学派的学术争鸣能够深化人们的认识,以此提高通史著作的质量,使新出版的著作后来居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新世纪版的《世界通史》,除了内容上要尽力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历史观念、理论框架和编撰体系上更应当吸取以往各种通史著作的经验,结合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创新点。而在理论创新方面,关键是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运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重视整体性和结构性,是研究世界通史的基本视角和方法。只有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结构性特征,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作出吻合于世界历史本质的解释。否则,面对繁杂的历史事件和色彩斑驳的历史行为体,世界通史的编写很容易陷入历史事件堆砌或国别史汇集的窠臼。

当前,以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世界历史运动正在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峰。鉴往知来,跨入新世纪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过去、理解现实、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这部新世纪版《世界通史》能够为满足这种需要有所贡献。

目 录

第一章 史前时代	1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	1
第二节 石器时代	7
第三节 国家的产生	14
第四节 史前文化	19
第二章 古代东方文明	25
第一节 古代埃及	25
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25
二、王朝的更替	28
三、文化	33
第二节 古代两河流域	35
一、巴比伦尼亚城市国家	35
二、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	40
三、文化	42
第三节 古代波斯	43
第四节 古代印度	46
一、雅利安人的入侵与种姓制度	46
二、佛教的兴起	50
三、文化	53
第三章 古代希腊文明	56
第一节 希腊文明的起源	57
一、爱琴文明	57
二、荷马时代	60
三、希腊城邦的形成	61
第二节 古典时代的希腊	68
一、希波战争	68
二、社会经济与奴隶制的发展	69
三、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全盛期	71
四、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希腊城邦制度的衰微	72

五、古典文化	75
第三节 希腊文明的扩展	81
一、马其顿的兴起	81
二、亚历山大的东征	82
三、希腊化国家	84
四、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86
第四章 古代罗马文明	92
第一节 罗马文明的发端	92
一、罗马城的创建	94
二、王政时代和塞维·图里乌的改革	94
第二节 罗马共和国的崛起	96
一、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	96
二、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	98
三、罗马对地中海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征服	101
四、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105
第三节 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过渡	107
一、西西里奴隶起义	107
二、格拉古兄弟改革	108
三、马略军事改革	109
四、罗马共和国危机的加剧与斯巴达克起义	111
五、军事强人政治与共和制的倾覆	113
六、共和时代的文化	117
第四节 罗马帝国的兴衰	119
一、奥古斯都元首政治与早期帝国	119
二、晚期帝国的危机	125
三、早期基督教	128
四、走向衰亡	130
五、帝国时代的文化	133
第五章 中世纪欧洲文明	137
第一节 西欧封建文明的萌发	137
一、日耳曼诸王国的建立	138
二、法兰克王国	141
三、封建庄园经济	145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强化和西欧主要国家	147
一、西欧诸国的政治演进	147
二、罗马天主教会的兴盛	154
三、十字军东侵	156

四、西欧中世纪文化	162
第三节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164
一、西欧中世纪城市	164
二、城市经济活动	168
第四节 拜占庭与东正教文明	173
一、拜占庭帝国初期的经济与政治	173
二、拜占庭的封建化	176
三、东正教的影响及其流布	178
四、拜占庭帝国的衰亡	180
五、拜占庭文化	181
第五节 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	183
一、基辅罗斯国家	183
二、蒙古的征服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187
三、沙皇专制制度的确立	190
四、9—17 世纪的俄罗斯文化	193
五、波兰和匈牙利	197
第六章 7—15 世纪的亚洲封建文明	203
第一节 东亚和东南亚	203
一、朝鲜	203
二、日本	207
三、文化	213
第二节 越南	214
第三节 蒙古	217
第四节 印度	221
一、封建制度的确立	221
二、德里苏丹国	224
第五节 阿拉伯文明	227
一、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	227
二、阿拉伯帝国时代	231
三、文化	234
第六节 奥斯曼土耳其	236
第七章 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	243
第一节 非洲	243
一、非洲的自然及人文环境	243
二、北非民族和国家的演进	244
三、撒哈拉以南的文明古国	250
第二节 美洲	260

一、美洲的自然环境与印第安人	260
二、中美洲与墨西哥古代文明	261
三、南美安第斯高原的印加文明	266
第八章 西欧走出中世纪	268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268
一、生产关系的质变	268
二、社会政治的新变化	273
第二节 开辟新航路	279
一、新航路的开辟	279
二、早期殖民扩张和反抗斗争	283
第三节 文艺复兴	285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及其传播	285
二、中世纪晚期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292
第四节 宗教改革	294
一、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294
二、宗教改革和西欧诸国	300
第二版后记	302

第一章

史前时代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其上限始自人类的出现,其下限则为氏族制度的解体。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也没有私有制度,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构成了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历时 300 余万年的原始社会大体上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即前氏族公社和氏族公社时期。前氏族公社也称血缘家族公社,是早期猿人、晚期猿人和古人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存在时间约自距今 300 万年前至距今 50000 年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类实行族内婚,生产活动局限于采集或猎取天然动植物,按自然分工方式共同劳动。氏族公社是新人的社会组织形态,前期为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为父系氏族公社,存在时间约距今 50000 年前至公元前 4000 纪。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完备的氏族部落组织和定居村落,婚姻关系逐渐由群婚演变为对偶婚,乃至一夫一妻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人类主要的谋生手段。氏族公社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私有制的萌芽,原始社会最终为阶级社会所取代,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世界各地各民族原始社会的解体时间不一,最早者在公元前 4000 纪至公元前 3000 纪就已进入了阶级社会,而个别地区的落后部落直至近现代还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度。

第一节 人类的起源

艰苦的探索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探索自身的起源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现过许多各式各样的答案。

流传至今的一些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最早臆测,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人类是神用黏土制造的,古代中国、埃及、西亚和希腊等都曾有过类似的传说。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利用这一问题大做文章,使之蒙上一层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基督教的《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记》便称,上帝先是从空虚混沌状态中创造了天空、陆地、海洋、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兽鱼虫,随后又根据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对男女分别取名亚当和夏娃,乃人类之始祖。18 世纪英国的爱尔兰大主教厄谢尔甚至公然宣称,亚当是公元前 4004 年 3 月 23 日下午 4 点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荒谬的上帝创造人类说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地方广为流传,并被奉为不容置疑的最高真理,反对者无不受到残酷迫害。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科学的答案。18 世纪瑞典学者林奈创立了动物

分类系统,将人和猿都归入了灵长目,从而为日后进化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809年法国学者拉马克勇敢地否定了上帝造人说,其专著《动物哲学》一书明确指出,动植物的种类并非固定不变的,高等动物是从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并大胆推断人类起源于类人猿。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学术界拉马克的观点鲜有支持者。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根据自己对生物界多年的直接观察和实验,详细论述了生物界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自然选择是导致物种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的主要原因,新物种的形成和旧物种的消亡是自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达尔文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规律,奠定了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基础。达尔文还将进化论的理论应用于人类学,进一步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中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依据,论证了人类与类人猿的亲缘关系。马克思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并曾向达尔文建议,在《资本论》的若干章节内专门介绍他的学说。由于惧怕资产阶级的舆论攻击,达尔文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达尔文未能科学地说明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及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仍然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该学说不仅猛烈冲击了有关人类起源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标志着人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飞跃,为科学的人类起源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达尔文在世时,他的生物进化学说就已得到广泛传播,支持者甚多。

1876年,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恩格斯最终创立了科学的人类起源学说。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产生的规律,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并强调劳动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最本质区别。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百余年来世界各地发现的大量原始人类化石和生产工具,日益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一般认为,生活在数千万年前、现已灭绝的古猿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最初古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它们利用上肢攀援寻找食物,后肢则紧握树木的枝干以支撑全身的重量。不同的运动方式,使得古猿躯体的各个部分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发生缓慢的变化,体形上显得上肢较长,下肢较短,这就为上、下肢的进一步分工和下地直立行走创造了条件。后来可能是由于气候、地理环境的变迁,地球上的森林面积缩小,出现了成片的草原和林间空地;同时,猿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数量的增多,使得树叶等食物来源显得相对不足,在一些特定的季节矛盾更为突出,求生的本能遂迫使部分古猿转向地面,放弃了树上生活。在地面生活中,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古猿上、下肢的分工更为明确,上肢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活动也更趋复杂,下肢则主要用于行走,久而久之古猿开始能够直立行走。直立行走是猿向人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因为直立行走不仅使上肢得到解放,能够经常使用石块、木棒等天然工具,而且躯体位置的变化,也促进了脑容量的扩大和头部各种感觉器官的发展。

人类形成过程中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他们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结为群体,集体劳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他们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迫切需要一种交换思想和表达意见的工具,猿类不发达的喉头遂逐渐得到改造,口部器官也慢慢学会了发出清晰的音节,因此语言亦为劳动的产物之一。语言和同时产生的思维活动进一步促进了脑髓和感觉器官的发展,人类的抽象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09页。

力和推理能力亦随之上升,这又反过来推动了语言和劳动能力的提高。经过若干万年的劳动,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双手越来越灵活,不仅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天然工具,而且最终还能制造工具。制造工具完成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质变,从此人和猿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

攀树的猿群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了三个有关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科学概念,即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为科学阐明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奠定了基础。

攀树的猿群是指成群生活在树上的古猿,它们是人类的前身。

1911年在埃及法雍发现的原上猿化石,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猿化石,这类古猿生存于约3000万年前。6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另一类古猿化石,其中包括一个差不多完整的头骨,它们被定名为埃及猿,生存于约2800万年前。原上猿和埃及猿体形较小,大概都属于林栖动物,四肢行走。

1856年,在法国圣戈当发现了森林古猿的化石,后来在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地方亦都出土过同类古猿化石,种类繁多。其生存年代较晚于上述两类古猿,约为2300万年前至1000万年前。森林古猿也是林栖动物,四肢行走,生活在树木茂盛的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之中,以树叶和果实为食物。

人类研究者大多认为,原上猿、埃及猿和森林古猿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

正在形成中的人 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的生物。

腊玛古猿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正在形成中的人,生存年代约为1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许多地方都曾发现过这类古猿化石,如喜马拉雅山南面的西瓦利克丘陵、我国云南的开远和禄丰、东非肯尼亚的特南堡、匈牙利东北部的路达巴尼亚、希腊雅典近郊的底尔哥斯和土耳其的山迪尔等地。已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多为上、下颌骨碎片,牙齿和若干个完整的下颌,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出土于1980年末,地点在我国云南禄丰县的石灰坝,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的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已发现的化石来看,与森林古猿相比,腊玛古猿的脸部较短,吻部后缩,牙齿成弧形排列,比较紧密,犬齿不突出,臼齿有较大的咬合面,这些特征表明腊玛古猿比较近似于人类。一些学者还推测,腊玛古猿已是地面觅食者,身高约1米,脑容量300毫升左右。

较腊玛古猿晚一些的正在形成中的人是早期南方古猿。1924年,南非汤恩发现了第一个南方古猿头骨化石。1936—1941年间及二战以后,南非、东非和亚洲又发掘出大量南方古猿化石。从1973年开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乍得等地先后出土了一批年代更为久远的人类化石,据测定距今约350万年至六七百万年。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化石均为南方古猿化石,迄今为止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些学者曾将南方古猿视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他们认为南方古猿和完全形成的人同时并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旁系。南方古猿灭绝于100万年前左右,最终没能进化为人。

一般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能够利用下肢直立行走,不再承担支撑职能的上肢遂逐渐具备了钳形的抓握功能,这对有效地搬运物体和使用工具都大有裨益。此外,直立行走还提高了正在形成中的人防卫、反击猛兽袭击的能力,这类袭击是地面生活中不可避免、且经常发生的事情。同时,与野兽的抗争也使正在形成中的人获得了新的食物来源,从此他们在食草的同时也开始食肉,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

正在形成中的人虽然还不能制造工具,但已经能够使用天然工具。20世纪60年代以

后,英国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只身深入非洲热带丛林,潜心观察、研究黑猩猩的生活行为,她发现黑猩猩也能使用和加工简单工具。有学者据此提出,不能将制作工具的能力作为区分人类和动物(古猿)的根本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将双足直立行走也作为区别人类和动物的依据之一。在肯尼亚特南堡发现腊玛古猿化石的地层中,还有大量被砸裂的牛、鹿、羊等动物的兽骨、脑壳和一些边缘破损的石块,有学者认为腊玛古猿正是利用这些天然石块作工具,砸破野兽的肢骨和头颅,以取食其髓和脑;石块边缘破损,乃连续使用的结果。

根据对化石的研究还可发现,在生存竞争中正在形成的人中间大概已出现了最初的语言。因为较之森林古猿和现代类人猿,腊玛古猿的犬齿窝更近似于人类的犬齿窝,从解剖学上来分析,犬齿窝是用以固定一块帮助嘴唇运动的筋肉的,由此推测腊玛古猿很可能已经具备了说话能力。

完全形成的人 完全形成的人是指能够制造工具的人。国内学术界一般将完全形成的人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古人和新人。完全形成的人的体态特征在前两个阶段尚近似于猿类,故称猿人,到后两个阶段已与现代人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早期猿人是最早的完全形成的人,有关化石和材料大多来自非洲。1974至1975年间,坦桑尼亚北部伽鲁西河流域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主要是上、下颌骨和牙齿等。距今约377万年至359万年之间,部分学者将其视为迄今所知的最早的早期猿人化石,但由于出土化石的同一地层中没有发现经过打制的石器,即人工制造的工具,所以这一结论尚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一些年代稍晚的人类化石也属同一类情况。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人工制造的工具,是1968年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部发现的一些经人工打制的砾石器,包括砍斫器和修整石片等,距今约261万年,但同一地层中没有发现人类化石,1972年以后在其下30余米的地层中发现了若干人类颅骨化石碎片及腿骨和下颌骨化石,距今约300万年至270万年之间。根据这些化石大致可以推断,他们的脑容量约为700毫升,肢骨与现代人相似。

较晚一些的早期猿人化石是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能人”,其意为“人能,手巧,头脑灵活,精力充沛”。据测定,能人化石距今约175万年。在发现能人化石的地层中出土了许多经打制的石器,如由熔岩砾石加工成的砍斫器等大型工具和由石英岩制成的石片等小型工具,这些石器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已具有一定的类型。能人平均脑容量为646毫升,大于早期南方古猿、小于晚期猿人的平均值,体态特征也介于早期南方古猿和晚期猿人之间,主要表现为头骨薄而呈穹隆形,眶后收缩程度较小,前部齿相对较大。

相比较而言,目前已发现的早期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等的数量还十分有限,因此研究者对早期猿人的体质形态、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亦知之甚少,有些结论仅是理论分析和推测,尚存分歧,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有待于考古的新发现。

晚期猿人基本上已能像现代人那样直立行走,故学名为直立人,亚、非、欧三大洲均发现过晚期猿人的化石。

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的头骨和牙齿化石,是最早发现的晚期猿人化石,其后又在同一地层出土了完整的大腿骨化石,距今约80万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爪哇岛又发现了3个头骨、若干个下颌和牙齿的化石。爪哇猿人取直立姿态,前额扁而斜,眉脊像帽檐一般向前突出,脑容量平均为870毫升左右。爪哇猿人已具备说话能力,手足有了明显

的分工,习惯上善用右手。有间接证据表明,他们能够制作粗劣的石器为武器,过着狩猎生活。

在欧洲也出现过若干晚期猿人的化石,其中较为著名者为1907年发现于德国海德堡附近的一块下颌化石,距今约80万年。

我国发现的晚期猿人化石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不仅澄清了若干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证明了劳动创造人的理论的正确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起源问题的深入研究。位于北京西南54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的故乡,这是目前世界上古人类化石最丰富的一处遗址,经1927—1932年、1934—1937年、1949年和解放后的历次发掘,共出土5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骨和许多颌骨、肢骨、牙齿的化石。遗憾的是,抗日战争前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下落不明,虽然多方大力寻找,但至今仍无影无踪。据测定,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69万年,身高约1.56—1.57米,与现代人相似,平均脑容量略小于现代人,为1043毫升,这表明北京猿人已处于比爪哇猿人更高的发展阶段。

部分国外研究者一度对北京猿人的头骨较多地保留了原始的性质,肢骨却接近现代人的特征感到困惑不解,我国学者在劳动创造人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研究正确地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指出,由于手足分工,使双手在劳动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与劳动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同时手足分工也强化了两腿的支撑功能和行走功能,且它们也是人体结构中比较活动的部分,因此手足进化的速度较快,最早向现代人方向发展;而头骨和大脑的发展则依赖于直立行走和人类劳动能力的提高,所以比较而言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人类体质的进化演变过程中,思维器官和劳动器官不是同步发展的,前者明显要慢于后者,这再次证实了劳动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除了猿人化石外,周口店龙骨山还发现了10万余件石器材料、用火痕迹和百余种动物化石,这清楚地表明北京猿人在生存竞争中完成了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跃,即工具的制造和火的使用。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北京猿人使用的工具多以石器为主,偶尔也使用一些其他材料的工具。大部分石器采用直接打击法、垂直打击法和碰砧法制成,类型可分为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也有部分石器,主要是石片,未经修整便直接使用。最厚处达6厘米的灰烬及灰烬中的树籽壳、骨片等,证明北京猿人已经学会了用火,并能将猎获的野兽烧熟后食用,由此一方面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增加了营养,从而有助于人类体质的强壮;另一方面也找到了更有效的御寒和防范、猎取野兽的手段,生存的安全系数大为提高。此外,用火也提高了北京猿人的社会化程度,发展和巩固了猿人的群体组织,因为在学会人工取火以前,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取得天然火种,并保存之,使用之,任何个体都难以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由此猿人的团结意识和组织意识日趋加强,对集体的约束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1963年和1964年在我国陕西省蓝田县又发现了蓝田猿人的化石,主要是上下颌骨、头骨和牙齿化石,距今约95万年至69万年之间。蓝田猿人的体态特征较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都更为原始,头骨骨壁较厚,额骨较宽,且明显后倾,脑容量约为780毫升。同一地层出土的石器,制作技术粗糙,器形简单。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距今约170万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表明我国西南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1973年后在发现元谋猿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又出土了经打制的石器,与蓝田猿人时代的石器相似。此外在1974—1984年间,在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也发现了猿人化石、用火痕迹和经打制的石器、骨器。从时间上看,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晚期猿人化